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NATIONAL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KEY BOOK PUBLISHING PROJECT

下
卷

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

朱寿桐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NATIONAL TWELFTH FIVE-YEAR PLAN KEY BOOK PUBLISHING PROJECT

下
卷

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

朱寿桐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第四卷 理想与斗争 | 1

- 第三十四章 阶级斗争与共产理想的文学文化变奏 | 5
- 第三十五章 “理想主义”、“斗争哲学”与左倾思想文化 | 23
- 第三十六章 为理想而斗争的教育文化 | 35
- 第三十七章 新中国宪法与政法文化的建构 | 53
- 第三十八章 戏剧文化的国家仪式与民间化 | 64
- 第三十九章 理想与斗争中的电影文化 | 81
- 第四十章 斗争文化与学术批判 | 92
- 第四十一章 理想之歌与斗争音乐 | 108
- 第四十二章 社会主义美术文化与设计探索 | 133
- 第四十三章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媒体文化 | 151

第五卷 改革与开放 | 161

- 第四十四章 改革开放时代的思想与学术文化 | 165
- 第四十五章 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热” | 182
- 第四十六章 文学文化中的改革与开放 | 197
- 第四十七章 教育改革与新时期的教育文化 | 211
- 第四十八章 大众传媒文化及广告设计 | 223

第四十九章 思想启蒙与戏剧文化的变革 | 237

第五十章 高潮迭起的音乐文化 | 251

第五十一章 思想解放与美术新潮 | 261

第五十二章 “灵性”文化的追索 | 279

第六卷 多元与和谐 | 291

第五十三章 多元媒体时代的文化景观 | 295

第五十四章 网络文化与网络时代的围观文化 | 313

第五十五章 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文学文化 | 328

第五十六章 走向多元发展的教育文化 | 345

第五十七章 多元化和复调性思想学术的展开 | 357

第五十八章 多元文化与中国戏剧文化的复苏 | 371

第五十九章 多元发展与多维发展的音乐文化 | 389

第六十章 当代美术文化的多元发展 | 405

第六十一章 宗教文化的多元呈现 | 420

跋语 百年历史的文化记忆与学术传述 | 437

第四卷

理想与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1951年3月,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5月,经毛泽东作重要修改,《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

1952年6月开始,胡风遭到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递交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集中阐明了自己的文艺见解。1955年5、6月间,《人民日报》整理公布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胡风很快被逮捕。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反击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即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同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些都成为“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发动了

“批林批孔”运动。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标志着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的发动。

1976年4月5日,借清明纪念周恩来总理,北京天安门爆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随即影响全国。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逮捕。

这本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因而自上而下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任何时代都洋溢着理想的激情。即便是在贫穷的困难时期,人民和文化人都不轻言理想的放弃。

这确实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置身世外,与斗争的环境绝缘。斗争遍布于党内党外,斗争存在于各个社会层次。有你死我活的揭发、打击,也有彼此防范的摩擦、倾轧。

以斗争开始,以斗争结束,完整的斗争文化,完整的时代;为什么而斗争?为了理想!为理想而斗争,却找不到理想的斗争方式,更没有理想的斗争对象。

第三十四章

阶级斗争与共产理想的文学文化变奏

新中国的文学文化基本上延续着延安传统,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不仅成为文学家必须恪守的信条,而且也成了一种文化习惯,成了积淀于文学家和文人灵魂深处的文化信仰。显然,这种革命化的文学文化与新文化最初的民主倾向有某种渊源联系,与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传统有直接联系,不过进入新中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的文学理念和文化信念迅速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自上而下必须遵循的文化戒律。在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具有权威性和政治性的文学理念和文化信念必然寻求戒律的效用。意识形态的戒律化运作一度成为这个时代文学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阶级文学的意识形态戒律化运作

革命的文学理念早在左翼文化运作中,就已经发展成一种文化信念,它让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文学家都对这样的文学文化观念深信不疑,以至国防文学的热潮兴起以后,鲁迅还孤独地坚守着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科学的文艺论”,为左联的匆促解散扼腕长叹,同时坚持让革命的大众文学作为抗日民族文学的主导力量。他面对左翼文学阵营在急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势下轻易放弃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做法深致不满,指

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1〕}。这样的认知或许在当时的激进者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真切地体现着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信念之真切、坚定。

革命文学由文化信念向政治伦理的转化,乃是从延安文艺整风开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形势下的革命文学理念和革命文化信念做出了更加政治化的阐释,将革命文学的文化信念上升为一种政治道德和观念伦理。毛泽东的创造性正体现在,他从人民性和工农兵主体的角度,对于革命队伍的文艺工作者阐明了这样的政治道德和观念伦理: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2〕}

显然,这里建立了并阐释了一种新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劳动和劳农为上,以心灵、情感之善为美。政治的运作往往以善为号召、为倡导的理由,为理论的依据,由此形成政治伦理;无产阶级的政治伦理和政党伦理以劳动、劳工、劳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肯定为善,为美。毛泽东以生动的中国化的语言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伦理,并将它用来推进、提升无产阶级的文学理念和文学信念。关于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如果说左翼时

〔1〕 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6),第6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3),第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

期完成了由理念向信念的转变,那么,延安文艺整风乃是实现了由信念向伦理的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化伦理确立以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领导的革命与斗争服务,就成了文学家必须遵守的道德。道德的基础是善,是一种关于伦理的价值观,它的基本实现方式是主体的自觉,外在的制约和“不德”的惩罚往往通过理论的谴责与批判,一般不会诉诸对人身自由的剥夺。

进入新中国以后,文学、文化迅速被纳入社会主义的体制化。从国家管理序列,政务院文化部的设置,沈雁冰、郑振铎、田汉等一大批著名文学家进入文化部,成为各个重要机构和委员会的领导人;从党的群团管理序列,第一次文代会以后,中国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以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称“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对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事业实施管理职能。国家还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院课程的调整,将文学教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通过课程设置的途径将其体制化;中国科学院设立文学研究的专属机构,解放军内部设立以总政治部为领导的文艺管理体制;加上各级各种各领域的文学杂志的创办,这些杂志都隶属于上述机构的不同层次及相应的管理序列。新中国的这种文化艺术管理序列的设置吸收了苏联的经验,当然也有自身的创造。中国作家协会的职能及其运行明显受到苏联作家协会的启示,只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将党的权力直接交付给作家协会来执行,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宣传部作为全面管治全国文艺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更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十分关注文学艺术和新闻宣传,毛泽东不仅对重大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动向热切关注,而且还在关键的时刻发出指示、批示和意见,就像他从延安时期就养成的习惯那样,往往自己代党报党刊撰写社论,将自己的巨大影响力直接通过自己的文章公之于众。这样的高端关注及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中国文学迅速进入党的意识形态层面,并参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环节。

上述严格和全面的组织和机构布局,以及特定的运行机制的形成,完全实现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体制化。文学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和工农兵

服务的现代伦理,从此演化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体制要求,秩序要求,甚至是政法要求,各种经过理念化、信念化和伦理化运作的革命文学原则和观念,此时在一定意义上硬化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戒律。文学受制于某种政治戒律之后,文学文化才可能真正与政治文化同步,文学的政治化才能真正成为文艺家的自觉行动。无疑,这在文艺管治和文学领导的意义上是非常理想的文化生态。

当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甚至一定时期的政治要求作为文学管治的戒律付诸实施之际,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相应运作的许多环节上借道于文学批评和文学批判,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正是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意识形态的运作往往更多地从文学批判入手,这在一定意义上,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成了中国特色。

由此,应能清楚地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文学政治运作的逻辑必然性。

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在党的上层爆发了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争议,由此拉开了文学批判意识形态化甚至文学政治戒律化的大幕。这部电影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摄制并公演,编剧姚克,导演朱石麟,主要演员有舒适、周璇、唐若青、洪波等。此影片以清宫上层围绕着戊戌维新所展开的宫廷斗争为题材,对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以及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谴责,同情戊戌维新运动及失败了的光绪皇帝。其实,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所代表的清宫权力结构,对于新中国一开始的权力构架之间存在着某种外人很难理解的隐喻关系,江青对这种隐喻的过敏性反应直接导致了领袖对这一影片的挞伐,并且与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的意见针锋相对。资料记载,江青调看《清宫秘史》后,向毛泽东汇报说:《清宫秘史》是部坏影片。毛泽东后来断言:《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但中宣部并未迅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表态: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不能批判!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这场批判运动才得以展开。

这场文艺批判不是以禁映《清宫秘史》为结局,而是以此为开始。以后的文艺斗争和文学批判乃至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通常都会追溯到这个影片及其批判。据历史资料显示,从1950年到1964年这十几年间,毛泽东五次在不同场合点名批判《清宫秘史》,其核心内容仍是,这部电影表面上是爱国主义的,实际上是卖国主义的,应该受到批判。最典型的是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相关人士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严肃地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他当然指的是有火力的政治批判和公开批判。

针对这部电影真正体现足够火力的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出现。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和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2〕}两篇最具有杀伤力,也最能揭示这场批判的政治实质。姚文元文章显然不是为了批判《清宫秘史》而写的,但他的“顺带”批判却权威性地披露了毛泽东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那封信中的观点,并暗示须对“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个“大人物”就是指“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数月后戚本禹的文章更加明确,说是“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至此,对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早已经超出了文艺评论乃至文学批判的范围,而成为党内最高层两条路线斗争的工



〔1〕 载《红旗》，1967年第1期。

〔2〕 载《红旗》，1967年第5期。

具。“卖国主义”的性质认定足以让这部电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对待这部影片的态度,也就成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层级上区分党内革命派和反动派的标准与戒律。

显然,戚本禹的文章比姚文元的文章更迫近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尽管前者明显得到了特别授权披露毛泽东给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那封信的内容。戚本禹分析道:“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 and 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这可以说道出了毛泽东心目中的文艺的戒律,也可以说是原则和逻辑:对农民革命起义历史作用绝不容忍怀疑,更不能鼓吹以其他改良主义运动冲淡或者否定农民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上,电影《武训传》遭到了同样酷烈的批判。这部电影以对武训乞讨兴学的历史刻画,明喻周大所走的武装抗争的道路既无前途也不合法。这样的道路对比正触犯了毛泽东这个革命领袖的戒律,与戚本禹揭示的电影《清宫秘史》的要害完全相通。人们从后来的政治、文化立场可以质疑甚至责难毛泽东对文艺作品发动的政治批判,却无法否认毛泽东的批判是有原则的,与江青等人往往从一己私利出发发动文艺批判的宵小作为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发动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非常严肃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这就说明在他看来,《武训传》触及了他的原则,也即触犯了她的革命戒律。《武训传》中的武训以及历史上的武训,为了兴办“义学”,通过讨乞购置大量田产,然后收取田租并放高利贷,由此走上了虽有些苦情但实际上实施剥削的道路,这正是毛泽东从土地革命时代便深恶痛绝的地主阶级的做派。即使没有武训成为地主阶级的那些置办田产、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的恶劣情节,单是他通过出卖穷人人格的病态行为来办义学,也不能赢取重视农民、尊重农民的革命领袖的好感,何况它还明目张胆地否定农民革命,歌颂通过武训体现出来的充满奴性和屈辱的

“奋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毛泽东对怀疑甚至否定农民革命的艺术企图严词批判，这正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政治戒律，也是他的文艺原则。凡是触犯这种戒律，冒犯这种原则的文艺现象，都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与清理。而且，同对《清宫秘史》的批判一样，对《武训传》的态度依然成为辨别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与依据：“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1〕}这样的情形令革命领袖痛心疾首，因为从他的戒律和原则出发，面对历史的武训现象以及周大现象，是非异常清楚，正误极其明确。

文学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文学及文学理论如果不能与无产阶级政治保持一致，就触犯了革命的政治戒律，就必然成为斗争的对象，成为批判和清算的对象。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定位仍然由党的领导人发动和主导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胡风是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以鲁迅式的显示灵魂的深刻为价值目标的文学理论家，这样一个理论家即使表现出对于工农兵文学的趋近的热忱，也必然显示其突出的个性。而当这种突出的个性及其显露的深刻是以“肉搏”人民所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为主要内容，其人民观就与革命领袖所确认的革命伦理有了较大参差，那种伦理观认为，农民的思想感情要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许多。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参差，由于同样触犯了革命文化的戒律，因而被夸大为是一种立场的对立，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

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

〔1〕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5），第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1〕}。

于是,胡风在反右派运动之前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关进监狱二十余年。这是革命文学文化戒律化以后的必然后果,而在此之前,当共产党的革命文学和政治文学只是作为信念和文化伦理的时候,对于斗争和批判对象就很少采取这样的法律制裁措施。由此可以联想到延安整风时期对王实味的处置,王实味不仅是文学上的异见分子,还是被认定为托派的敌人,即便如此,在延安撤退、中央机关转移的紧要关头被社会部紧急处决后,毛泽东还每每对此耿耿于怀,常常问责于李克农等人。



胡风

当革命的政治文学和相应的文学文化进入党和国家的戒律运作序列以后,文学批判和文化斗争就必然与法律制裁措施相联系。其中牵涉面最广,受影响人数最多的当然是对于小说《刘志丹》的批判,这部被最高领导层明确定义为“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化和政治事件,致使习仲勋等一万多名领导干部遭受惩处,许多人因此案身陷牢狱。

毛泽东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激情的领袖。他和他的党,他的人民一起艰苦卓绝地推翻了旧世界,并满怀豪情地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他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从来就不相信梦想,他深知未来的新世界不会唾手可得,需经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注释了他领导社会主义文艺斗争的历史,也注解了在他的时代文学斗争此起彼伏从未止息的现实。

〔1〕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5),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从反右斗争以后的“再批判”，到“黑八论”的批判，再到引起轰轰烈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激烈的批判运动，其中荦荦大端者有对“三家村”的批判，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十七年”的批判，对各种影片、文学作品的查封，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的批判，评法批儒运动，评《水浒》运动，等等。这些从文艺战线出发而事实上牵动全国乃至全民政治生活的批判运动，都符合那个讲求阶级斗争时代的文化节奏，同时也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旋律。

尽管毛泽东发动的文学批判和文化斗争都往往基于一定的原则和戒律，但也存在着为斗争而斗争的斗争文化现象。1954年秋，毛泽东发动中国知识分子对胡适从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展开全面的思想批判，同时又通过《红楼梦研究》的讨论，进一步肃清胡适在文学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毒素。其实，毛泽东对胡适并无天然的恶感，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讲话中明确肯定胡适“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龚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又认为比较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胡适的看法还“比较对一点”，进而肯定了其对“新红学派”的学术贡献。而之所以要在思想文化界全面掀起批判胡适运动，是为了营造和鼓励文化斗争的时代气氛。毛泽东对“两个小人物”表示支持的批示，只是坐定俞平伯是胡适派的资产阶级权威，他们的思想具有毒害青年的毒素，明确正确的选择就是对之进行斗争和批判：“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至于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要害在何处，具体体现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出现了哪些大谬不然的观点，显然不是毛泽东所关心的，他事实上并没有在《红楼梦》研究以及在其余学术文化问题上提出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针锋相对的观点，他所要看到的正是对胡适文学研究所发动的批判，包括对“胡适派”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权威所进行的批